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政治观念史稿·卷五

刘小枫 ● 主编



沃格林(E. Voegelin) ● 著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ity

霍伟岸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刘小枫 ● 主编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观念史稿. 第5卷: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 / (美) 沃格林(Voegelin, E.)著;
霍伟岸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6685-9

I. 政 ... II. ①沃...②霍... III. 政治思想史—世界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005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刘丽霞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 :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ity

By Eric Voegeli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L. Wiser

Copyright © 1998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051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政治观念史稿(第五卷):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

(美)沃格林 著

霍伟岸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685-9/B · 494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遂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迄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出的书——《政治观念史》。这部著作于1930年完成，但直到1980年才由美国学者对它进行“破译”，出版英文版。之后，该书又在1982年被翻译成德文版。《政治观念史》一书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既非政治哲学、法学或社会学的“纯学术”著作，也非历史学著作，而是将政治哲学、法学和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的政治思想史。沃格林在书中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全新的理解。

中文版出版说明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奥地利，阻断了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一部《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这部《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废置了这部“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帙过大”，远远超出“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思想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被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

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废置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承担组译的北京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

刘小枫

2007年7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第五部分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卷四续)

第二章 大混乱之二:决定与立场 / 15

- 一、问题概述 / 18
- 二、拉博埃蒂 / 28
- 三、反君主主义潮流 / 42
- 四、耶稣会思想家 / 68

第三章 英国:胡克 / 80

- 一、英国政治思想的开端 / 80
- 二、国家的封闭 / 85
- 三、异口同声 / 89
- 四、胡克的基督教国家 / 92
- 五、清教徒的肖像 / 103

六、法律哲学 / 116

第四章 政治体间关系：维多利亚 / 127

- 一、国际主义 / 128
- 二、宏伟蓝图 / 131
- 三、国家间法的概念 / 132
- 四、国家间关系与文明间关系的区别 / 135
- 五、正义战争 / 137
- 六、帝国主义的法律技术 / 142
- 七、维多利亚其人 / 151
- 八、文明间关系的后续发展 / 154

第五章 历史与自然中的人 / 157

- 一、现代性问题 / 157
- 二、波焦 / 162
- 三、鲁雷 / 168
- 四、占星术 / 176
- 五、宇宙论 / 183
- 六、第谷 / 192
- 七、数学 / 195
- 八、布鲁诺 / 199
- 九、无限性的观念及其应用 / 208

第六章 博丹 / 213

- 一、地中海的现代性 / 214
- 二、著作风格 / 218
- 三、博丹的宗教：传记资料 / 220

- 四、《给让·巴图的信》 / 223
 - 五、弥足珍贵之死 / 226
 - 六、纲要 / 228
 - 七、上帝、天使与人 / 232
 - 八、宗教宽容:《七人宗教对话录》 / 243
 - 九、历史 / 260
 - 十、博丹:别篇 / 280
- 英汉对照索引 / 299
- 译后记 / 327
- 附录:《政治观念史稿》(1—8卷)总目录 / 330

希望是“立德树人”，一个“内外两门”的“中庸”和“中庸”。他指的“内外两门”的“中庸”是“中庸政治”（或曰“中庸政治哲学”），“中庸”是“中庸政治”的“中庸”。他所指的“中庸政治”是“中庸”（或曰“中庸政治哲学”）的“中庸”。他所指的“中庸”是“中庸政治”的“中庸”。

英文版编者导言

译者序 / 编者导言 / 简介 / 目录 / 文献与注释 / 参考书目

对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研究，我最初接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我正在读大学，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政治观念史稿》（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是中文译本，由吴黎平、王东、王东明等合译，由三联书店于 1982 年出版。我被书中丰富的知识、深邃的思想、精妙的分析深深吸引，从此便开始了对沃格林的研究。之后，我陆续阅读了《新政治科学：一个导论》（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两篇论文》（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Two Essays）、《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等著作，对沃格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开始尝试着用中文撰写有关沃格林的文章，如《试论沃格林的“政治哲学”》、《浅议沃格林的“政治哲学”》、《浅议沃格林的“政治哲学”》等，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了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一书中。之后，我又翻译了《新政治科学：一个导论》、《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两篇论文》、《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等著作，这些译作后来都收入了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一书中。之后，我又翻译了《新政治科学：一个导论》、《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两篇论文》、《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等著作，这些译作后来都收入了我的《政治哲学研究》一书中。

对这项“政治观念史”研究，沃格林为他的编者们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描述，在其中的一种描述中，他把拟定的研究分为三个年代学上的时期：^① 被称为“城邦与哲学”的第一个时期，下迄公元前 300 年；以“帝国与基督教”命名的第二个时期，上起公元前 300 年，下迄公元后 1500 年；被称为“灵知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从公元 1500 年至今。

熟悉沃格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新政治科学》和《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②——的人们会看到，灵知主义（Gnosticism）

① 《沃格林全集》卷 19，《政治观念史稿》卷 1，《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9,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 I, *Hellenism, Rom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ed. Athanassios Moulaki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页 13; 中译本参华师大 2007 版, 页 16。

② 沃格林：《新政治科学：一个导论》（*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和《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两篇论文》（*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Two Essays*, trans. William Fitzpatrick, introduction by Ellis Sandoz, 1968; rpt. Washington, D. C.: Regnery, 1997)。

这个词被沃格林看作最有用的术语之一,可以帮助他自己更好地理解政治现代性的本质。考虑到同时代的政治科学尚未做到成功地真正理解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集体主义运动——也就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沃格林力图更好地理解被他看作时代的无序(the disorder of the age)的现象。他最初的努力——以《论政治宗教》^①为题出版——认为,那最初看上去可能是一个纯粹世俗的现象,本质上具有宗教的特征。^[2]在这个分析中,沃格林特别把国家社会主义解释为本质上内在的政治宗教(essentially immanentist political religion)的一个例子。通过把人类对存在的基础的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内在化,这种形式的宗教事实上建立在对世俗秩序的特定特征的神化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是一种特别现代的现象:它宣称,它的原则是受到现代科学的种种学说支持的。但与此同时,据沃格林早期的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尽管现代,却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且显然是反复出现的宗教意识(religious consciousness)形式的又一个例子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沃格林本人开始质疑这种理解的适当性。由于把这两样内在化的宗教运动——一方面是现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埃及太阳神的古代崇拜——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没能承认它们在类别上的重要区别。埃及太阳神崇拜,在以色列、希腊和基督教对超越(transcendence)的清晰表达之前。那就好像人的灵魂——作为超越的感觉中枢——还未被“发现”。^②

① 沃格林:《论政治的宗教》(*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 Vienna: Bermann-Fischer, 1938)。

② Bruno Sne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trans. T. G. Rosenmey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0).

在这样一种发现发生之前,现实(reality)被体验为紧凑的和未分殊化的(compact and undifferentiated)。但是,当希腊哲学及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启示等事件发生之后,早期的对一种紧凑的和未分殊化的现实的理解,就被对秩序本身的超越之源的发现所“纠正”。这种发现,是在意识中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一旦它发生了,人们若不有意忽视这种新近得到清晰表述的真理,就不能简单地回到早期的各种系统表述中去。在下述意义上,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埃及的太阳神崇拜,那就是前者要求回避现实的一个维度,而这个维度对那些生活在发现它之前的人们来说,尚未变得显而易见。埃及的太阳神崇拜,以当时人们对它的真切体验的方式表达了现实的真理。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则试图否定现实的秩序,而这秩序,在作为超越的感觉中枢的灵魂被发现之后,已经开始为人们所理解。沃格林之前的处理,把两种崇拜形式看作本质上相似的现象,从而没能理解这种重要的区别。

[3]对政治宗教的概念作为理解政治现代性的一个分析范畴的不准确性的不满,促使沃格林重新考察他此前的著作——这种重新考察正是他在写作《政治观念史》时进行的。那一努力的成果,体现在他的《新政治科学》中。在那里,沃格林总结说,“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兴起”。^① 相对于他早期努力的优越性,从他的观点看,这种分析是基于下述事实的:它更准确地解释了,使现代性的群众运动与它们的古代类似物相分殊

① 《新政治科学》(*New Science of Politics*),页126。后来,随着他的作品趋于成熟,沃格林承认把现代性描述为单纯就是灵知主义的不公平地化减了它的复杂性特征。虽然灵知主义仍然是现代意识的一个基本的——如果不是本质的——特征,但更为适当的分析还必须包括启示录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秘术的(hermetic)和炼金术的主题。

的原因。当现实的超越基础在希腊的哲学传统,以及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启示传统中被发现,并得到清晰表述之后,现代灵知主义要不适当当地重新神化那已经被恰当地去神化了的东西,就必然预设了要预先否认人类的存在结构本身。随着对灵魂的发现,现实被理解为既有一个世俗的维度,也有一个超越的维度。作为有形的和精神的存在,个人同时参与了这两个维度,并且使他们的历史性存在生活于“两者之间”,而不是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就现代灵知主义拒斥了超越的维度,结果绝对化了世俗领域而言,它用一种想象的第二现实——人类在其中是完整的和完满的——取代了人类存在于“两者之间”的现实。通过否认超越的彼岸,现代灵知主义意识创造了一种现实的视象(vision),把人类置于它的中心。拒绝了超越性的秩序之源,人现在就有力量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现实秩序。因此,这项现代计划的核心,就是努力创造一种现实的图像(image),它可以维持这样的可能性,即人类自己变成了意义和秩序的源泉。

哲学产生于对存在之爱;是人类充满爱意地去努力理解存在的秩序,并使自己与这一秩序相和谐。灵知(Gnosis)渴望对存在的支配;为了控制存在,灵知主义者(the gnostic)构建了他的体系……但只有当存在真的在他的掌握之中时,思想家[4]才能用他的体系控制存在。只要存在的起源在此世的存在之外;只要永恒的存在无法用内在于世界的、有限的认识工具所完全洞察;只要神的存在只有通过存在之类比(*analogia entis*)的形式才能被思考,那么一种体系的建构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项冒险事业确实即将被认真开启,那么思想家必须首先去除这些不便之处:他必须如此来解释存在,以便在原则上存在处于他的建构的掌

握之中。^①

沃格林把现代性分析为本质上是灵知主义的,这表明,日益消减的对超越经验的理解,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的结果。现代人已经选择忽略把现实体验为开放性的和以超越为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权力意志。通过一个过程,这个选择看上去对现代西方文明已经变成规范性的了,这个过程始于16世纪,而沃格林在本卷中将要考察的正是这一时期。

二

本卷是从第四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卷尾就已经提出的一项讨论的第二部分开始的。这个承前启后的部分的标题是“大混乱”。在第四卷中,它引入了沃格林对路德和加尔文的分析。具体而言,它论及了由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所引发的范围极广的事件和观念。路德教义的传播,开启了一个争论不休、革命迭起和党见泛滥的时期——其核心含义,却几乎没有被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所抓住。在这个时代,要获得充分的自我理解的部分困难,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哲学语言。宗教改革的反哲学的精神,已经削弱了宗教哲学分析的权威,而由像苏亚雷斯那样的耶稣会思想家所做出的、试图恢复经院哲学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再造了一个教条主义的体系,而不是发展了一种新的批判研究的传统。所以,这个时期的大部政治辩论,局限于党派性的和着眼自身利益的文献(partisan and particularist literature),既不能产生对时代问题的条理

^① 《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页30。

清楚的分析,也不能产生对它们的适当的回应——那些时代问题同时涉及教会和政治。

[5]对教会而言,发生这些问题,主要由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分解成为多个信仰不同教义的共同体。教会成为宗教改革的压力、分裂主义倾向和教派运动所共同指向的目标,此外,还受到加尔文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普遍主义教会的威胁,后者既不寻求改革罗马天主教会,也不寻求与之断绝关系,而是试图用一个新的普遍主义模式来完全取代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由各个教义共同体所构成的复杂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和宗教战争。

对这个时期的政府而言,中心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随着基督教世界的解体,政府不再能通过诉诸传统的基督教对于世界的理解来解释其所扮演的角色。于是,必须要找到一些世俗的和自然的原则,使它们可以充当政治秩序的基础。慢慢地,人民主权的概念,变成了这些原则中最为有力的一个,存在的目的(*raison d'état*)被接受为一个可以自我证明的主张。

纵贯 16 世纪,欧洲的智识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s)一直变动不居,但这些变化是早期各种不同的运动的累积效应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事件或个别思想家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个时期缺乏一种明显的思想连贯性。回顾起来,现在看上去对于人性、世界和社会的新理解正在形成之中,但事实上,这些新理解直到 17 世纪才得到了系统的表述。欧洲传统的智识和精神秩序已然崩溃,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的普遍秩序尚未出现。因此,16 世纪的文明看上去在精神上已经解体,而在智识上也是支离破碎的。宗教改革用多元教会取代了统一教会,每个教会现在都宣称其代表真正的信仰;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典文本的复兴——它揭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即使不是更高级的异教文